

## 論文

### 從黃凡小說〈命運之竹〉談都市變遷與人的適應問題

施又文\*

#### 摘要

黃凡小說〈命運之竹〉描寫靠賺取微利謀生的台北小市民，錯過投資置產的機會，隨著東區的發展，這些小商、小工階級成為高度資本化都市的受害者；加上都市人與人之間的隔離，進而產生生理和心理的失調。

對比於舊階級的敘述者，他的父母雖然是都市快速變遷下的失敗者，但他靠著高學歷而有不錯的工作、相當的資產與消費能力，晉身為新興中收入階級且身心相對平衡。然而上一代的不安與焦慮依然揮之不去，不安與焦慮似乎成為八〇年代台北市市民的集體潛意識了。

**關鍵詞：**黃凡、都市小說、命運之竹、八〇年代、都市變遷、適應

#### 一、前言

黃凡的小說不僅足以做為八〇年代小說的代表之一，在學術界更受到廣泛的關注，多方討論方興未艾，諸如研析黃凡的政治小說與都市小說的學位論文，<sup>1</sup>或者作主題性的探討而兼及政治與都市議題的研究論文。<sup>2</sup>至於單篇的期刊論文，所討論的黃凡小說包括：〈小說實驗〉、<sup>3</sup>〈大學之賊〉、<sup>4</sup>



---

\* 朝陽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sup>1</sup> 楊雅雯，《黃凡的政治小說》，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年)；廖家均，《黃凡八〇年代都市小說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2010年)。

<sup>2</sup> 藍建春《黃凡小說研究：社會變遷與文學史的視角》，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年)。黃政榕，《曖昧的戰鬥--黃凡小說的討論與實踐》，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年)。

<sup>3</sup> 簡月娟，〈現實與虛構的衝突--試論黃凡〈將軍之淚〉、〈小說實驗〉〉，《空大學訊》，291期(2002年6月)，頁71-82。廖宏霖，〈小說再實驗--續寫黃凡的〈小說實驗〉〉，《文訊》，395期(2018年9月)，頁72-77。

<sup>4</sup> 李吟臻，〈馬庫色與黃凡的對話：《大學之賊》中的單向度思維〉，《雲漢學刊》，17期(2009年3月)，頁81-101。郭強生，〈從超載到失重--評黃凡《大學之賊》中的政治隱喻〉，《文訊》，230期(2004年12月)，頁18-19。

〈賴索〉、<sup>5</sup>〈反對者〉、<sup>6</sup>〈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sup>7</sup>〈人人需要秦德夫〉、<sup>8</sup>〈慈悲的滋味〉、<sup>9</sup>〈青州車站〉、<sup>10</sup>〈30號倉庫〉、<sup>11</sup>《躁鬱的國家》、<sup>12</sup>〈將軍之淚〉、<sup>13</sup>〈都市生活〉、<sup>14</sup>〈傷心城〉等。<sup>15</sup>

本文探討的〈命運之竹〉這篇小說，敘寫八〇年代突然富裕起來的台灣，一些無法適應社會變遷者的生活狀態。文中提到靠蠅頭小利謀生的小市民，捨不得將錢投資房地產，等到八〇年代台北東區房地產暴漲，他們

- 
- <sup>5</sup> 季季，〈冷水潑殘生--評黃凡〈賴索〉〉，《書評書目》，80期(1979年12月)，頁73-86。林依潔，〈揉和傷感與嘲諷的熱情--黃凡筆下的知識份子(賴索)〉，《明道文藝》，67期(1981年10月)，頁115-121。楊佳嫻，〈時差讀「賴索」〉，《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85-86。
- <sup>6</sup> 龍應台，〈很累人的一本小說--評黃凡的《反對者》〉，《新書月刊》，15期(1984年12月)，頁30-32。陳宜武，〈評〈反對者〉的反對者〉，《新書月刊》，17期(1985年2月)，頁46-49。王德威，〈凸現了一則政治神話--黃凡《反對者》〉，《聯合文學》，1卷4期(1985年2月)，頁203-204。蔡英俊，〈主題與呈現--試論黃凡《反對者》的兩難〉，《文星》，103期(1987年1月)，頁98-103。譚嘉，〈一本考驗讀者的小說--黃凡的《反對者》〉，《文訊》，39期(1988年12月)，頁90-96。古嘉琦，〈可憐者必有可恨之處--讀《反對者》〉，《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87-88。
- <sup>7</sup> 余詠雯，〈巴代耶「排泄書寫」與「踰越」理論--黃凡〈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的分析〉，《台灣文學教學集刊》，1期(1998年6月)，頁23-51。許榮哲，〈請問黃凡先生：「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90-91。張耀仁，〈如何測量水溝的寬度？訪黃凡〉，《明道文藝》，393期(2008年12月)，頁43-47。
- <sup>8</sup> 李志薈，〈一九八〇年，我們的大亨小傳--讀「人人需要秦德夫」〉，《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86-87。詹宏志，〈資本主義社會的疏離人--黃凡〈人人需要秦德夫〉〉，《書評書目》，86期(1980年6月)，頁109-117。
- <sup>9</sup> 王德威，〈「新」台北的浮世繪--評黃凡〈慈悲的滋味〉〉，《聯合文學》，第6期(1985年4月)，頁215-216。伊格言，〈一輩子的隱喻--讀「慈悲的滋味」〉，《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89-90。
- <sup>10</sup> 陳佳琦，〈冷戰下的中國想像與反共意識形態：以黃凡〈青州車站〉、《零》為例〉，《台灣文學研究》，3期(2012年12月)，頁111+113-174。詹宏志，〈晦黯的、飄搖的希望--評析黃凡的〈青州車站〉〉，《書評書目》，88期(1980年8月)，頁86-95。
- <sup>11</sup> 未著作者，〈黃凡30號倉庫〉，《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68-84。
- <sup>12</sup> 張耀仁，〈票開出來了--讀《躁鬱的國家》〉，《聯合文學》，231期(2004年1月)，頁91-92。
- <sup>13</sup> 簡月娟，〈現實與虛構的衝突--試論黃凡〈將軍之淚〉、〈小說實驗〉〉，《空大學訊》，291期(2002年6月)，頁71-82。
- <sup>14</sup> 王德威，〈人間喜劇：評黃凡的〈都市生活〉〉，《聯合文學》，3卷7期(1987年5月)，頁212-213。
- <sup>15</sup> 鍾鳳美，〈讓一切都隨風而逝--談黃凡小說〈傷心城〉〉，《文藝月刊》，209期(1986年11月)，頁34-46。

跟不上經濟快速的脈動，而永遠活在焦慮當中。這篇小說記錄了八〇年代都市的變遷與人們的因應問題，相當具有代表性，相關的論述文字散見各專書某一小段，<sup>16</sup>而且都只是淺略帶過，因此筆者才會想要進一步做專題性的論述。

## 二、作者介紹

黃凡，本名黃孝忠，1950 年出生於台北市萬華區，畢業於中原理工學院(今中原大學)工業工程學系。曾任職於貿易公司、食品工廠、建築公司，也做過台灣英文雜誌社企畫、聯合文學特約撰述，聯合文學社務顧問等出版工作，生活經驗豐富。1979 年他以短篇小說〈賴索〉獲得第二屆時報文學獎小說獎首獎而崛起文壇，在 1980 年代陸續出版了 15 部小說，種類包括政治小說、都市小說以及科幻小說。1981 年《大英百科全書》將其評價為 80 年代台灣最有代表性的小說家。<sup>17</sup>

黃凡的政治小說如前述的〈賴索〉以及《大時代》、《傷心城》、《反對者》等等，描寫政治對社會生活的侵蝕和人們深陷政治漩渦無以擺脫的困境。而他的都市小說，如《財閥》、〈人人需要秦德夫〉、〈范樞銘的正直〉等等，將資本主義的都會中，人們追求財富的諸多面貌、壓力、焦慮和社會問題展示出來。

作家白先勇特別激賞黃凡的才華，認為〈賴索〉的主題：「深而且廣，觸及台灣現實的核心」，而小說的表現手法，「異常突出，完全是現代的，運用時空交錯意識流技巧，將七十年代後期，台灣都市工業化後，急促喧囂的步調，表露無遺。」<sup>18</sup>葉石濤曾稱他：「是屬於知性型作家，他已超過

---

<sup>16</sup>張大春等著，林耀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市小說選》(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89 年)，〈〈命運之竹〉評析〉，頁 140-141；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7-18；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頁 38、41；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頁 114；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6 年)，頁 371。

<sup>17</sup>黃凡基本資料，參考如下幾種文獻重新整理：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市：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206-207。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頁 53。「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大事紀-黃凡」網頁：[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 查閱日期：2019.4.19。「黃凡」，維基百科網頁，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83%E5%87%A1> 查閱日期：2019.4.19。

<sup>18</sup>白先勇，〈邊際人--賴索〉，收錄於黃凡，《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

了鄉土文學。從現代社會各種活動現象，來凝視人性和行為。他代表了八〇年代的創作目標與創作的方向。」<sup>19</sup>呂正惠認為黃凡「更像一個社會學家，想要探索動盪不安的台灣社會的種種面向」，<sup>20</sup>可以說是近二十多年台灣小說家中最掌握台灣社會整體「動態」的人。

我認為，林秀姿評析八〇年代都市文學與黃凡的關係最為中肯，他說：「黃凡作品再現了一個經濟大變動的 1980 年代，……他所再現的台北，非僅止於經濟狀況下的東區與都市生活，其實更包括了在 1970 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再結構以來，台北市東區被納入了全球經濟的一環，整個台北市東區的政治、經濟、社會關係的轉變與調適，都是黃凡所處理的時代。……在黃凡的老台北人眼光底下，試圖再現一個 1980 年代中期台北資本造成的社會變遷，塑造新中收入階級的新文化，以及相對被替代掉的人群們情境，這正得以對照陳映真所強調的資本城市的面向。」<sup>21</sup>

### 三、〈命運之竹〉故事大要

民國 46(1957)年的仁愛路還是農村景緻，敘述者的母親梁老太(為避免與敘述者的妻子混淆，故此稱呼，下同。)隨著相命師連城伯前往松山看地，然而目的地卻是一大片的竹林水田，梁老太拿著打蛇用的竹子探向田裡，感覺碰不到底的不踏實，她怎麼也不相信這塊地日後有增值發展的機會，於是放棄了當時一甲才十萬塊的水田。但是從「民國五一年開始，這塊水田每隔三、四年地價便上漲一倍。」等到民國 61(1972)年，國父紀念館落成那一年，它的身價「每坪二十萬元，總值六億元。」土地的計算單位由田地的「甲」，轉變為住宅的「坪」了。<sup>22</sup>

梁老太老是唸著「未來是有錢人的天下」，卻沒有把握住成為有錢人的機會，讓她在往後的三十年中天天後悔，後來梁老太經營的小雜貨店漸走下坡，加上敘述者的父親因竹編鷹架斷裂而死，多重壓力使梁老太精神失

---

2006)，頁 198。

<sup>19</sup>見「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大事紀-黃凡」網頁，網址：

[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https://tln.nmtl.gov.tw/ch/m2/nmtl_w1_m2_c_2.aspx?person_number=L45002) 查閱日期：2019.4.19.

<sup>20</sup>呂正惠，〈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收錄於《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市：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81。

<sup>21</sup>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頁 26。

<sup>22</sup>本文所引〈命運之竹〉原文，悉參照黃凡，《曼娜舞蹈教室》(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 年)，頁 113-127。茲此說明，後文引用不再另注。

常而住進療養院，念茲在茲的仍然是房地產，猶如台北人集體焦慮的象徵。小說寫出了「特定時空下生產方式與社會結構變遷的人文面」；那令敘述者母親精神失常的是「使那塊土地變成『不動產的動產』的新社會。」<sup>23</sup>

〈命運之竹〉還不滿 5000 字，時間橫跨了 30 年，它呈現了一個由於資本推動所造成的社會變遷，帶來了台北小市民集體的不安與焦慮。

#### 四、1980 年代的台灣與小說所呈現的社會變遷

黃凡生長於都市，從 1950 年代到 2000 年代的 50 年間，台北市歷經農、工、商、服務業等各種產業的轉型，黃凡以其自身經驗作為主要背景來書寫都市小說，〈命運之竹〉塑造了適應不良的舊階層小商工，與新興的中收入階級，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反映了台北這座資本城市的第一手資料。王國安說，黃凡在〈命運之竹〉中以懷疑、旁觀、嘲諷的書寫態度，表現都市變遷的故事，顛覆了七〇年代鄉土作家的理性說教、社會責任感的書寫方式。<sup>24</sup>

##### (一) 〈命運之竹〉所描述的社會變遷與新舊階級

〈命運之竹〉鋪寫的時間橫跨西元 1957 年—1987 年的 30 年時間，小說以倒敘的方式書寫 60 歲的母親已經長住消費昂貴的精神療養院 10 年了，敘述者梁先生也就是病患的兒子定期到療養院探望母親，他回到東區用晚餐的當下，由天池餐廳的環境回溯到 30 年前——梁老太錯過了投資水田的機會，竟由於是梁老太用了一支竹子探不到水田底而放棄買「一甲才十萬塊」的水田，沒想到此後這塊水田的價值連年飆漲，等到國父紀念館落成那一年(1972)，它已漲到六億元。

文本說：「我母親正活在兩個世界的夾縫裡」，五〇年代普遍匱乏的生活，敘述者的母親經營雜貨店，使用五燭光的照明設備，貨架式的陳列物品，交換的貨幣還有「一毛、兩毛、五毛的硬幣」這種型式，梁老太每天用碎紙條將堆成一疊的每十個硬幣再翻捲成筒狀，賺取蠅頭小利謀生。她曾經和相命師搭三輪車一齊前往東區看地，當年還是一片竹林水田的仁愛路一甲才十萬元，30 年後它成為全台灣最有名的觀光道路，其上每坪售價 12 萬元的大樓，而 2019 年的現今每坪售價已經超過 100 萬元。1972 年梁家經營的小雜貨店面

---

<sup>23</sup>張大春等著，林耀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市小說選》(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89 年)，〈〈命運之竹〉評析〉，頁 141。

<sup>24</sup>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台北市：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頁 114。

臨頹勢，敘述者的父親做營造業的水泥工，在扛水泥上工地的過程，因為靠著竹編欄杆休息，沒想到因為一根竹子突然斷裂，而從鷹架上摔下死亡。

本篇利用農村景象的變遷，1957年台北東區仍是竹林水田、三輪車，15年後國父紀念館等相關重大公共建設的落成，帶來東區的發展而轉變為大樓、建築工地等景觀，梁老先生從工地鷹架上摔死，由梁家與竹子的關連性，搭建出小說的架構與發展。1987年敘寫者描寫的當下，東區是滿街的有錢人與轎車，林立的大廈、公寓，一到晚上燈火輝煌，噴水池廣場、電梯大樓地下停車場、經過裝潢的餐廳或醫院等公共空間越來越多。

敘述者的母親在面臨收入遠遠跟不上房地產的漲勢、生意日漸蕭條、先生意外往生等多重變化後，並沒有像吳濁流小說〈先生媽〉的先生媽、郭良蕙〈四月的旋律〉的律師之妻石砵尼，把希望寄託於兒女；又或者像黃凡小說〈梧州街〉搬回老社區的媽媽，引入新的產業資本，注入了現代經營管理的形式的便利商店、麥當勞等，而成為社區的驕傲。梁老太跟不上時代的變化快速累積金錢，又無法轉變經營模式，她相信命運、卻不能安於命運，甚至屢次打碎觀音瓷像，始終自怨自艾。先生意外往生後，她封閉自我、不再與外界接觸，「梁老太」成了被金錢與慾望纏困糾結的台北小市民的縮影。

敘述者的童年，「坐在小櫃檯邊，幫著她(母親)數硬幣，有一毛、兩毛、五毛的硬幣，我將各種硬幣每十個堆成一疊」。可步入中年後，他觀看到都市的小孩普遍能享受可樂、汽球、漢堡、土風舞的慶生會，玩風箏、溜冰鞋，他不禁感嘆：「現在的兒童活在天堂裡，住漂亮公寓、彈鋼琴、玩遙控玩具。」因為貧困，需要兒童幫忙家務的過去年代；與科技化、富裕化，兒童享受吃喝玩樂的現在時空，亦形成截然的對比。

再者，〈命運之竹〉提到1970年代以前，敘述者梁先生與祖父、雙親同住，屬於折衷家庭的型式；1980年代成家的梁先生則與妻兒同住，患病的母親住在專業醫療機構，屬於核心家庭(小家庭)的型式。是否，小家庭已經成為1980年代台北家庭的主要形態？

不同於過去小商、勞工的舊中產階級，1987年敘寫者描寫的當下，小說中出現了學有專業的受薪階級，如梁先生、<sup>25</sup>醫師、護士，或者是屬於服務業的櫃台小姐、餐廳侍者、餐廳琴師。

---

<sup>25</sup>小說描寫，大學高學歷使晉身新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有汽車可開，付得起一家四口的生活開銷與母親長期的住院費用。敘述者的休閒方式是每個月一、兩天到高級餐廳用餐。

## (二)一路走來的 1980 年代的台灣

1950 年代，台灣經濟仍處於停滯狀態，絕大多數的台灣人僅能糊口，沒有儲蓄，更別說有發展工商業所需要的資本。<sup>26</sup>1960 年代，政府陸續推動《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外國投資人條例》、《華僑回國投資條例》及《獎勵投資條例》，設置加工出口區，對美日與歐洲的跨國公司提升了很大的吸引力。跨國公司開始在台灣投資勞力密集工業，尤其是美國民間跨國公司的投資，取代了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使得台灣繼續獲得推動工業發展所需的外來資金。這些跨國公司打開台灣工業化的大門，創造眾多的就業機會，吸引大批的鄉村勞動力湧入工廠或都市。除了跨國公司帶動經濟成長之外，台灣從 1953 年實施多期的經濟建設四年計畫與一期的六年經濟建設計畫，同時帶動工業發展，促成工業區及加工出口區在都市地區及都市邊緣地區廣泛設置。工廠由於地緣接近的關係，在眾多工廠附近形成具有工、商、服務等機能的新都市，工業化從而促成了都市化。<sup>27</sup>更大的都市除了生產以外，另有商業、金融、教育、法律活動，經由彼此相互需求的相乘效果，產生激勵經濟成長的作用。到了 1970 年的台灣，都市人口已經佔總人口的 55%。

據夏鑄九主持的研究指出，1980 年代以後，台北市六層樓以上的建築超過 50% 以上，成為主要建築類型，十層樓以上者，在 1990 年代以後更成為新的支配類型。特別是 1975 至 1989 的 15 年間，是台北辦公大樓的重要發展時期。1980 年代之前主要是發展企業總部辦公大樓和出售辦公大樓，1980 年代以後，湧現另一波企業大樓的興建熱潮，多集中於東區，成為區域性甚至全市性的新地標，如第一銀行總行、國泰建設大樓、惠普大樓、中國信託大樓、IBM 大樓等。這些新地標是本國金融、土地資本和跨國高科技產業資本的表徵。台北市「東區」，由於 1982 年建國南、北路與新生北路高架道路完工所造成的地理分割，成為 1980 年代最主要的空間變遷，房地產業者也以此來界定。特別是 1980 年以後的信義計畫分項實施，「東

---

<sup>26</sup>林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台北市：三民書局，1998 年)，頁 203。

<sup>27</sup>劉曜華在〈台灣都市發展史〉一文提到：「工業革命不但帶來製造業工作機會與投資機會，改變傳統一級產業為主的社會結構，帶動農村人口流入都市就業區，就業區的組成也帶動了關聯性工業及商業機會，促成都市的成長與擴張，造就了都市文明的新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網址：  
<http://www.taichung.fcu.edu.tw/%A5x%C6W%B3%A3%A5%AB%B5o%AEi%A5v2004.pdf> 查閱日期：2019.4.19.

區」傳達出進步、國際化乃至高級化的意象。<sup>28</sup>

再從台灣的人民平均所得來看，<sup>29</sup>1960年人均所得154美元，1965年人均所得217美元，1970年389美元，1973年695美元，1980年2344美元，1987年5298美元，1994年11604美元。<sup>30</sup>1980年代，多數的台灣家庭已經擺脫過去貧困的生活，溫飽之餘外，有儲蓄、也能享受更多的休閒娛樂。林鐘雄說：

經濟成長既帶來了人均所得增加，也使家庭及其勞動力的閒暇時間增加，……而多餘的閒暇時間當需有去處，公園、遊憩場所及交通設施都是不可或缺的，且其需求膨脹甚快。<sup>31</sup>

這就促成公共設施的規劃與興建，勢在必行了！

台灣工業化之後，工業升級也是發展中的必然趨勢，工業升級需要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需要更專業的管理人才與技術人才，高教育人才普及，種種因素促成中產階級的興起。章英華說，「都市提供了眾多的就業機會，而其居民教育程度也較高」，<sup>32</sup>而專業技術、行政主管和監督佐理人員的比例也最高。<sup>33</sup>

台灣中產階級的形成，多半受惠於高學歷而養成的專業人才，這樣的階級有別於以往的小農、小商、獨立工作者的舊中產階級，台灣的經濟結構於是由日治時期的「地主/佃農」的農業體系，發展至「資本家/勞工」的基本工業體系，再發展成「資本家/中產階級/勞工」的多元工、商業體系。學界

<sup>28</sup>夏鑄九主持，《空間實踐與後現代論述：台北東區之都市象徵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1991年)，頁93、103-104。

<sup>29</sup>人均國民總收入是指一個國家的最近一年的收入除以人口的價值。它反映了一個國家公民的平均收入。了解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和需求，第一步應了解它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對理解該國的一般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很有幫助。一個國家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與其社會，經濟和環境指標密切相關。例如，居住在較高的人均國民總收入國家的人民往往有較長的壽命，更高的識字率，更容易獲得安全飲用水，更低的嬰兒死亡率。「各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列表」，維基百科網頁，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4%E5%9B%BD%E4%BA%BA%E5%9D%87%E5%9B%BD%E6%B0%91%E6%80%BB%E6%94%B6%E5%85%A5%E5%88%97%E8%A1%A8> 查閱日期：2019.4.19.

<sup>30</sup>同註26，頁203-285。

<sup>31</sup>同註26，頁215。

<sup>32</sup>章英華，〈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收入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分析》(台北市：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年)，頁171。

<sup>33</sup>同前註，頁184。



對中產階級尚未有一明確定義，但是一般咸認是指有較高的學歷，有專業的技能，有穩定收入，有相當購買力，有不錯的社會地位等。<sup>34</sup>

鄧宗德的研究指出，特別是憑藉技能、學歷、文憑為取向的事業及管理人才等新中收入階級的興起，在 1980 年代中被突顯為都市人的典範與社會菁英。他們之能在社會結構中佔重要位置，固與台灣連繫上新國際分工的經濟網絡有絕對關係，同時，一種追求文化品味的生活方式，透過這些社會菁英的大量實踐，也正被合理化為都市人追求的生活目標。新興中收入階級居住在具有區隔性、表徵社會地位的大樓，藉由喝下午茶、穿名牌服飾、健康休閒……等多種消費方式、生活方式來建構自己的社會位置。<sup>35</sup>

很不幸地，隨著台灣現代化的加快、加深，工業化、資訊化、都市化帶來了大量壓力，伴隨而來不少的併發症，諸如：人際關係疏離、對於工作與情感的不安全感、競爭的壓力、經濟的拮据，過度或持續的壓力對身心健康造成損害。<sup>36</sup>早於 20 世紀初，美國精神科醫生已經發現，精神病院中原居於城區的病人比例較高。而城市生活所帶來的兩種負面情緒——疏離感與壓迫感，對認知錯亂及驚恐症特別相關。德國曼海姆中央心理健康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Mannheim)的腦科學家 Andreaseyer-Lindenberg 於 2011 年的研究發現，在面對壓力時，成長於市區的研究對象，他們的杏仁體反應較高，顯示他們的對壓力會產生較激烈的情緒反應，而調節杏仁體反應的大腦皮層區域 pACC 則較容易與杏仁體產生衝突，這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常見的腦內狀況。<sup>37</sup>

## 五、小說人物在都市與資本主義擠壓下的身心失衡與調適

首先，從象徵台北東區舊階級的梁老太與梁老先生(為避免與敘述者混淆，故此稱呼，下同。)來說。

---

<sup>34</sup>張光球，〈張光球觀點：台灣的中產階級哪裡去了〉，見「風傳媒-評論」網頁，網址：<https://www.storm.mg/article/454131> 查閱日期：2019.4.19.

<sup>35</sup>鄧宗德，《八 0 年代台北市支配性都市地景形成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頁 92-93。

<sup>36</sup>參考張典齊，〈我病了嗎？—論現代人的文明病〉，見「曠野專欄—專刊—心理健康」網頁，網址：<http://life.fhl.net/Desert/980312/008.htm> 查閱日期：2019.4.19.楊國樞，〈如何適應都市生活〉，見「心理學空間—心理學人—楊國樞」網頁，網址：<https://www.psychspace.com/psych/viewnews-2180> 查閱日期：2019.4.19.

<sup>37</sup>程玉然，〈「孤獨」這種都市病，會影響居民的精神健康？〉，見「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台灣-健康」網頁，網址：<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7140> 查閱日期：2019.4.19.

〈命運之竹〉梁老太出現的時間橫跨 1950-1980 年代，1987 年的她已經 60 歲。30 年前，她錯過機會購買仍是竹林水田的東區土地，當時一甲地才十萬元。爾後跨國公司進入台北市，大量勞動力湧入這座城市，重大公共建築東移，公共服務設施現代化，東區的土地一直在飆漲。梁老太每天一個硬幣一個硬幣的積攢小錢，可房地產在 1962 年以後成倍數上漲，漲到了 1972 年，她錯過的那塊地已經漲到每坪 20 萬元、總值 6 億元。她攢錢的速度被房地產高漲的速度遠遠拋在後面，致使她一直深陷於後悔的情緒當中。

再看看梁老太經營幾十年的小雜貨店，裡面空間昏暗、貨色有限、經營方式傳統，跟不上現代化經營、乾淨明亮的超級商店，以致生意越做越差。她樸實勤儉，相信傳統的一切，卻被快速流通的大額資本、通貨膨脹、都市開發、房地產高漲、現代化給打敗了。

1972 年，梁老太意外喪偶後，她不再踏出家門；住到精神療養院的 10 年，也未曾下樓過。她的床頭櫃塞滿了房地產廣告傳單還有算盤，她跟探訪的兒子交談，內容千篇一律的是房地產的漲跌。

簡單地說，梁老太一直沉浸在後悔、悲哀、焦慮的情感中，她跟不上時代快速的變遷，又無力去改變現狀，最後乾脆封閉自己，不再與外界接觸。

梁老先生只出現在 1972 年，面臨生活的需要，大病初癒的他仍勉強扛水泥上工地，卻意外喪生。小說中梁老太、梁老先生的不幸遭遇，都跟一根竹子有關，竹子面對都市的快速變遷、體制的龐大嚴密時，既構不著邊且體質脆弱，完全顛覆了傳統文化對竹子的解讀——君子、虛心、不屈等意涵。

屬於小商、小工舊階級的梁老太與梁老先生，被快速變遷的資本都市給淘汰掉，前者精神失常，後者工安意外喪生，他們象徵都市與資本主義擠壓下的失敗者。許琇禎認為，「封閉破碎的個體在對抗龐大物質體系」時，註定要「充滿焦慮與虛無」。<sup>38</sup>

貨幣本來是人們為提高交易效益，對一種媒介所達成的共識。然而到了高度資本主義的都市社會，人的價值能力卻體現在對貨幣的控制和佔有上，金錢反過來支配人、控制人，甚至使人的身心受到殘害。面對異化與物化交織的高度消費社會，〈命運之竹〉關注的是房地產與資本主義雙重擠壓下，失敗的小人物。

---

<sup>38</sup>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台北市：五南圖書公司，2001年)，頁45。

其次，再從象徵台北東區新興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梁先生來看。

在小說的開頭，藉由敘述者梁先生的口說出：「我隱隱約約覺得自己愈來愈像那些失常的病人。我想也許只有死亡才能終止這種不安的狀態。」這種恆常的不安，來自敘述者的母親長年住在消費昂貴的療養院卻不會復元的衝突焦慮，來自敘述者經年累月的身心疲憊，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快速變遷帶給他的不安全感。

敘述者梁先生也是處在兩個世界的夾縫裡--普遍匱乏的童年與物質豐裕的中年；永遠活在過去的母親與流動不居的都市。敘述者每天在工作圈一家庭圈一其他空間快速移動，不管他怎麼去適應這個環境，他依然神經質地惴惴不安。他一直在思考自家的問題：「我們究竟什麼地方犯了錯？」、「我媽為什麼要這樣，我是不是也受到她影響？」大學畢業、工作有成的敘述者，開自家轎車、擁有房產、付得起母親的住院費與一家四口的開銷、一個月兩次上有品味的鋼琴餐廳吃飯，這些物質享受是他的上一代一輩子不曾享受的。然而，誠如劉偉彥說的，「1980 年代台灣中收入階級仍屬新生狀態，對於本身的地位普遍有極大的不安全感」，藉由「消費及物質上的擁有」以建立自信。<sup>39</sup>台北東區新興中收入階級就是以消費及物質上的擁有來緩解不安的狀態，藉此保持身心平衡，以便繼續過生活。

敘述者說：「把自己交給神、上帝、菩薩，不曉得是什麼滋味。大學畢業後，我便不再去思考宗教、理想、人類未來這些傷腦筋的問題。」與此相關連的是精神院裡面，他的母親屢次打碎觀音瓷像，進而接受塑膠佛像。是否在都市與資本主義的擠壓下，物質已經取代了神成為都市人的信仰，敘述者從頂樓餐廳俯視周遭的當下，彷彿真的擁有那一塊地，而其實這是他付費用餐時眼目所及的錯覺。付費用餐的錯覺，成為一種暫時性、替代性的滿足。

簡單地說，新興中收入階級的敘述者梁先生因為擁有不錯的工作、相當的資產與消費能力，使得他在都市與資本主義社會獲得地位上的認可，而有相對平衡的身心繼續安穩過日子。

## 六、結論

1980 年代，台灣的人均所得翻倍成長，社會體系日益走向資本化，經濟力逐漸取代政治成為社會的主導力量，富裕繁榮成為 1980 年代的標籤，

---

<sup>39</sup>劉偉彥，《台北東區之空間文化形式--一個初步的社會分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頁 117-134。

台北市更為首屈一指的城市。

黃凡〈命運之竹〉收入 1987 年出版的《曼娜舞蹈教室》一書，小說描寫的時間橫跨西元 1950 年-1980 年代，而特別著眼於 1950 年代經濟匱乏，小商階級勤儉刻苦過日子；1980 年代高度資本化的力量延伸到台北東區的每一景觀，包括精神療養院、噴水池廣場、電梯大樓、休閒餐廳等。敘述者梁先生大學畢業，靠著高學歷與專業知識成為台北市中收入階級，他的生活與消費形式大不同於上一輩的情況。

再來看看都市快速變遷下小市民的身心調適問題。

〈命運之竹〉的梁老太最後跟社會隔絕、精神失常，常用悲哀的眼光、憂傷的神色來看待來訪的人。梁老先生大病初癒，為了糊口勉強去工地扛水泥而喪生，他們都是快速變遷下高度資本化都市的失敗者、也是身心不適應者。都市小市民無法適應快速變遷的高度資本化社會，連帶地反映在他們的身心上。黃自鴻說，黃凡小說中的空間是壓迫衰弱者身體的環境，小說的主人公絕大部分是身體孱弱或衰老的身體，無可避免的成為都市的受害者，這既能映襯出主角被打擊，也使得都市空間成為讀者可以捕捉、加以評說的對象。<sup>40</sup>

雖然小說的敘述者受到母親的影響而有些神經質，但是有社會地位、中收入的他，能夠以物質消費來換取心理上的平衡，顯然是相對的健康了。至於形而上的心靈或宗教信仰，似乎都被物質化的潮流給掩埋了。以物質的暫時性滿足、替代性滿足，紓解恆常的不安，似乎成為〈命運之竹〉所揭示的都市人的解藥了。

#### 參考文獻(以作者筆畫順序遞增排列)

- 王國安，《台灣後現代小說的發展：以黃凡、平路、張大春與林耀德的創作為觀察文本》(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2 年)
- 朱雙一，〈台灣社會運作形式的省思--黃凡作品論〉，收入施淑編，《黃凡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3 年)
- 呂正惠，〈八〇年代台灣小說的主流〉，收錄於《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2 年)
- 林秀姿，《重讀 1970 以後的台北：文學再現與台北東區》，台灣大學建築

<sup>40</sup>黃自鴻，〈聚焦身體與小說空間：兼論臺灣都市文學的衰弱身體〉，《東華人文學報》第 23 期(2013 年 7 月)，頁 179-225。

- 與城鄉研究所博士論文(2001 年)
- 林耀德，〈台灣新世代小說家〉，收入《重組的星空》(台北：業強出版社，1991 年)
- 林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年》，(台北：三民書局，1998 年)
- 計璧瑞，〈黃凡的文學成就〉，收入黃凡，《曼娜舞蹈教室·代序》(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 年)
- 夏鑄九主持，《空間實踐與後現代論述：台北東區之都市象徵研究》，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計畫(1991 年)
- 高天生，《台灣小說與小說家》(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賴索》(台北市：聯合文學出版社，2006)
- 張大春等著，林耀德編，《甜蜜買賣：台灣都市小說選》(台北市：業強出版社，1989 年)
- 張俐璇，《建構與流變：「寫實主義」與台灣小說生產》(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16 年)
- 章英華，〈都市化與機會結構及人際關係態度〉，收入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第一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資料分析》(台北：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 年)
- 許琇禎，《台灣當代小說縱論：解嚴前後(1977-1997)》(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1 年)
- 辜韻潔，《台灣當代商戰小說主題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年)
- 黃凡，《曼娜舞蹈教室》(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87 年)
- 黃自鴻，〈聚焦身體與小說空間：兼論臺灣都市文學的衰弱身體〉，《東華人文學報》第 23 期(2013 年 7 月)
- 劉偉彥，《台北東區之空間文化形式--一個初步的社會分析》，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 年)
- 蔡勇美、章英華主編，《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出版社，1997 年)
- 蔡振念編著，《台灣現代短篇小說精讀》(台北：五南圖書公司，2003 年)
- 鄧宗德，《八〇年代台北市支配性都市地景形成之研究》，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 年)
- 鄭明嫻主編，《當代台灣都市文學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5 年)
- 蕭新煌主編，《變遷中台灣社會的中產階級》(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9 年)